

经济学家

Teahouse For Economists

茶座

总第十六辑



十大关系新论——基于企业经济的视角

李海舰
蔡昉

王建国

陈彩虹

梁小民

王玉霞

刘佛丁

王玉茹

赵人伟

柳红

专业领域的名人及其“物”与“值”
文化、知识与信息——三维时代的困扰和现代管理的精髓
管理是一个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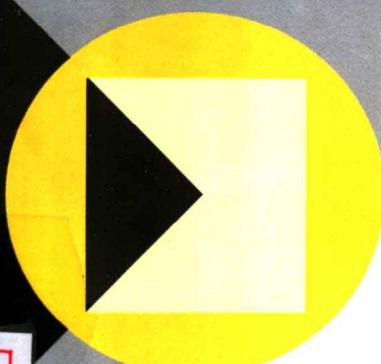
寓言中的经济学

家庭装修中的时间成本

南开经济学科的奠基人何廉·方显廷

对改革初期“曼德尔旋风”的回忆与思考
经济所的由来（二）

2004·2



茶座乾坤

●赖德胜

茶座之于中国，类似于咖啡馆或酒吧之于欧洲，因此，提及茶座，会使人联想到文人和艺术家常光顾的欧洲咖啡馆或酒吧。

我去过的最著名的欧洲咖啡馆可能要算巴塞罗那的“四猫咖啡馆”(Els Quatre Gats)。它面积不大，位于巴塞罗那的市中心，离我那时居住的地方有几十里之遥，但我还是经常去品玩。原因很简单，除它仍然保留有1897年成立之时就有的风貌之外，它还是著名艺术家比如毕加索(Picasso)、雷蒙·卡萨斯(Ramon Casas)、圣地亚哥·卢西诺(Santiago Rusino)等经常聚会谈艺和展览作品的地方。坐拥其中，发呆其中，能感受到世纪的变迁和不变。我去过的最著名的欧洲酒吧可能要数位于巴黎蒙马特的蹦蹦兔酒吧(Lapin Agile)。这个酒吧原先有个很恐怖的名字——“暗杀者酒吧”，后因画家安德烈·吉尔(A. Jill)在墙壁上画了一幅一个手持酒瓶的兔子从锅里跳出来的画而得名。酒吧的气氛很感染人。据说，只要进到里面，不论是谁，都会像抽了鸦片似的精神。之所以有如此效果，经营有方当然是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可能是，这里曾是毕加索、郁特里洛等艺术家在未成名时经常彻夜逗留的地方。

最近几年，茶座或说茶艺馆在我国如雨后春笋般冒起，我所在大学周边至少有几十家，而且我也偶尔光顾，但我认为最好者，也是我光顾最多者，当推“经济学家茶座”。“茶座”开门次数少，一年只对外开放四次，而且“茶位”也极为有限。但就是这样一个“茶座”，可谓是“茶客”拥门，既有经济学圈内的，也有经济学圈外的，既有资深的经济学家，也有在学的学子。他们在这里谈论国是，交流学问心得，介绍学界动态，让人流连忘返，形成一道亮丽风景。

真可谓是“茶座”乾坤大，学问日月长。



经济学家茶座 (第 16 辑)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东京
王振中 王瑞璞
冯兰瑞 刘 伟
刘方棫 刘国光
吴树青 汪丁丁
张卫国 杨瑞龙
林 岗 项启源
钟朋荣 洪远朋
洪银兴 胡培兆
赵 晓 顾海良
梁小民 程恩富
蔡继明

主 编
金明善
副主编
刘德久
执行主编
詹小洪
责任编辑
董新兴
陈丹丹

赖德胜 茶座乾坤 /1

【国是我见】

- 李海舰 十大关系新论——基于企业经济的视角 /4
程恩富 如何看待财富、富豪和劳动? /12
周肇光
朱铁臻 城市不是越亮越好 /17
郭梓林 “辞官下海”说 /21

【学界万象】

- 蔡 昉 专业领域的名人及其“物”与“值” /24
李 斯 “北京赣籍经济学人”群体扫描 /28
李中健 财富之于经济学家 /35

【学问聊斋】

- 王建国 文化、知识与信息——三维时代的困扰和现代管理的精髓 /40
蒲勇健 经济学的“惊喜” /48
吴克明 经济学视野中的生活艺术 /54
李成勋 经济学的时态：现在时、过去时和将来时 /59
刘福寿 如果经济学家不讲道德 …… /64

【他山之石】

- 陈彩虹 管理是一个故事 /68



- 魏 蔚 韩国科技实力究竟如何 / 74
 张东明 漫谈韩国的国有企业民营化 / 78
 詹小洪 旅韩日记(三) / 84
 黄燕芬 德国大学的经济学排名 / 96

【经济随笔】

- 赵 刚 衡门口的“油水” / 101
 王红领 “失信风险”大于“车险”的
张永山 经济学思考 / 106
 梁小民 寓言中的经济学 / 114

【生活中的经济学】

- 王玉霞 家庭装修中的时间成本 / 122
 李仁君 中美两国粮票的比较 / 126
 顾海兵 为什么没有人倒卖飞机票? / 129

【旧事重提】

- 赵人伟 对改革初期“曼德尔旋风”的
回忆与思考 / 135
 柳 红 经济所的由来(一) / 140

【经济学人】

- 刘佛丁** 南开经济学科的奠基人
何廉、方显廷 / 147
王玉茹 经济学套餐——我介绍的几
位国外经济学家 / 15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家茶座·第 16 辑
金明善主编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6

ISBN 7-209-03469-2

I. 经… II. 金… III. 经济学
— 文集 IV. F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48220 号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编辑部电话(0531)2098901

E-mail:chazuo@eyou.com

发行部电话
(0531)2098027 2098028 2098029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880×1230 毫米 1/32 开

5 印张 130 千字

邮发代号 24-180

定价:10.00 元

2AP82/103



十大关系新论

——基于企业经济的视角

◎李海舰*

近几年来，在研究企业经济的过程中，我感悟到“玩企业”实际上是“玩哲学”。尽管大哲学家不一定是大企业家，但大企业家一般都是大哲学家。不过，在大企业家的思维里，对传统哲学上若干重大关系的认识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突破”。实践是理论的最高评判。过去我们总讲理论指导实践，现在倒过来是理论服从实践。在理论与实践发生矛盾时，首先服从实践，而不是相反。地形变了，地图必须随之改变。这样来应对理论，我们叫做改变游戏规则。

1. 关于物质和思想的关系：思想决定物质

长期以来，我们大讲特讲物质决定思想（意识）。但从企业实践的角度看，现在看来看去却不是这么一回事了。现在，我们感觉倒是“思想决定物质”。企业有什么样的先进理念，最终就会有什么样的先进产品。所有企业最终拼的都是理念。就做企业而言，实际上是打造两条价值链：第一条是意识形态价值链，即信息→知识→能力→思想；第二条是物质形态价值链，即思想→技术→产品→产业。把一种思想物化成技术，然后再把技术物化成产品，最后把这种产品进一步扩展成一个产业。由此可见，企业的本质是“无中生有”，即，企业是“把思想变成财富的组织”，把思想经营成产业。用老人家的话说，就是“精神变物质”。财富是思想的物化，有财富的人是有思想的人。现在，所有企业都在遵循“思想决定物质”的规律，就是把思想变成物质，把好的思想变成好的物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质。这里,第一条价值链的终结是第二条价值链的起始。也就是说,物质形态问题在于意识形态问题。通俗地讲,钱袋子(物质)来自于脑子(思想),一种新思想就是一种新货币。鉴此,企业要建立学习型组织,员工要成为学习型个人。现在,企业的最高形态是学校,“把企业办成学校”成为企业的终极追求。这是因为,竞争力来自于学习力。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投资学习,一是学习知识、技能,二是改变理念、思维。这一切的背后,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断地夯实第一条价值链。现代企业,首先不是制造产品,而是制造概念;然后,把概念变成产品,把概念变成财富,把概念变成生产力。正如《商业秀》书中所言:“思想份额总是优于市场份额的。除非你能拥有赢得客户的思想,否则你是打不开他们的钱包的。”所以,一个企业有没有核心竞争力,关键是看这个企业有没有当今最先进的经营思想。

2. 关于对立和统一的关系:统一高于对立

过去,我们老讲对立,不讲统一,或者讲对立高于统一。而对立就是“斗争”,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现在看来,是倒过来了:统一高于对立。所谓发展,就是矛盾的双方在同一体中共舞、共赢。只有树立这样一种思想,企业才能发展,国家才能繁荣。

就企业层面而言,其实私和公是在一起的。只要公不要私没法发展。我们现在的国有企业改革,提倡发展混合经济,就是“从关心个人利益出发来关心国家利益”,就是“利用私来发展公”,私和公是一致的,即在国有资产里面注入个人资产,为使个人资产增值就必须使整个资产增值。关于两权分离问题,这是很基本的常识。而现在的改革越来越倾向于两权合一,即经营者拥有部分所有权或完全所有权。实践表明,这样的企业制度安排最好,运行效率最高。鉴此,经营者持股、经营者控股,即经营者成为所有者这样一种趋势日益发展。

就国家层面而言,关于国有资产和私有财产的关系,不论姓啥,第一位的是它们都是国家资产。在改革过程中,要么国有资产少了,国家资产多了;要么国有资产少了,国家税收多了。退一步讲,尽管私有财产姓私,但是“私营企业姓公”。就终端环节而言,私营企业的产品满足



的是社会供给,私营企业的就业解决的是社会问题,私营企业税收的享用者是社会公众,私营企业的利润扩大的是社会需求(大部分利润购买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实际上是扩大内需;剩余利润存入银行,国家用来运作增值)。可见,私营企业已经完全“社会化”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法人)企业一律姓公。这里,财富的创造从私有开始,财富的享用以公有结束。

总之,要首先确立从对立走向统一这样一个理念,继而不断强化“统一高于对立”这样一种思想,这是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全部奥秘所在。

3. 关于内部和外部的关系:外部决定内部

过去,我们总讲内因决定外因,内部决定外部。现在看来,则是外部决定内部。就企业而言,外部社会需求决定内部企业功能,外部市场规则决定内部企业制度,外部市场理念决定内部企业理念。一切游戏规则都要围绕着客户转,一切制度安排都要围绕着市场转。所谓战略管理,就是不断解决使内部适应外部的问题。一切围绕着外部转,“中心在外部”,以外压内,以外攻内。这是因为:

①客户利益至上。与传统认识的股东利益至上不同,现代企业按照客户利益至上运作。贯彻客户利益至上原则,这是保障股东利益至上的前提。改革以来,我们经历了由“国家本位论”到“企业本位论”的转变,现在则将进一步转向由“企业本位论”到“客户本位论”的革命。

②价值曲线对接。得客户者得天下,客户认可才是最高认可。因此,做企业首先要讲究和外部对接,即企业供给价值曲线和客户需求价值曲线对接。前一时期,我们国家各个部门都出台了好多政策,要求企业“眼睛向内”挖掘、革新、改造。但是,如果不和客户需求价值曲线对接,你再挖掘、再革新、再改造也没有用。可见,首要是“眼睛向外”,只有和外部对接了才有内部的发展。

③资源来自外部。与传统企业重心放在整合内部资源不同,现代企业重心则放在整合外部资源,依靠政府、金融、高校、网络乃至全球的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本赢得利润,即借帆航行、借鸡下蛋、借网捕鱼、借力



发展。一个现代企业的衡量标准,在于利用(外部)多少资源和拥有(内部)多少资源的比例关系上,前者可能是后者的十倍、百倍乃至千倍、万倍。

④利润来自外部。与传统认识中的利润来自企业劳动不同,现代企业利润来自市场认可。客户认可就有价值,客户不认可就没有价值;客户购买得多,价值就高,客户购买得少,价值就低。价值是由客户决定的,价值是由市场决定的。过去,价值创造是最重要的;现在,价值实现是最重要的。而价值能否实现、实现多少则完全取决于外部认可。

4. 关于量变和质变的关系:先质变后量变

过去,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发生质变。也就是说,先量变后质变。现在则是,先质变后量变。一般而言,企业历经了三次层级。一是做大——只有把规模做大了,单位产品成本才能不断降低,以满足消费者“价廉”的需求,这以20世纪前半期的美国企业为代表。二是做好——只有把品质做优了,产品精益求精,才能扩大市场,以满足消费者“物美”的需求,这以20世纪后半期的日本企业为代表。三是做对——首先要把事情做对,然后再不断地去做好、做大它,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这是进入21世纪以后所有企业的努力方向。换句话说,过去谁做得好、谁做得大,谁就能在市场上活下来;现在则是谁做得对,谁就能在市场上生存下来。“首先要把事情做对”,体现的正是“先质变后量变”的思想。反过来说,你做的这个东西不是客户所认可的,做得再好也没有用,做得再大也没有用。因此,首先要做得对,再做得好、做得大。“第一次就做对”,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先决条件。“第一次就做对,每一次都做对”,这是现代企业成功的公开秘密。

量变和质变关系的换位,取决于渐变和突变地位的改变。过去,渐变是社会生活的主流;现在,突变是社会生活的主流。用英特尔公司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安迪·格鲁夫的话讲,竞争中的因素短期内一下子发生了“10倍速变化”。也就是说,现在“高速状态”成了常态,质变成了“家常便饭”。换句话说,过去,变化是连续的,即线性的;现在,变化是非连续的,即非线性的。就企业而言,一个优秀的企业,它是制定游戏



规则而不是遵守游戏规则，通过改变游戏规则赢得竞争优势；就产品而言，一个优秀的产品，它要求的是“品味”而不仅是“品质”，品味高于品质；就员工而言，一个优秀的员工，他具备的是“气质”而不仅是“素质”，气质高于素质。基于“质变主流”的现实，现在第一和第二已经不是数量关系而是本质不同。臭皮匠就是臭皮匠，诸葛亮就是诸葛亮，他们之间根本没有可比性。10万个臭皮匠也顶不上1个诸葛亮。

5. 关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时间空间互换

过去，时间就是时间，空间就是空间，时间和空间之间不能转换。现在，所有成功的企业都是以时间消灭空间、以空间消灭时间的，时间和空间之间可以根据需要实行互换。

①以时间消灭空间。例如沃尔玛，整个运行系统由计算机网络实施控制，采购、配送、运输、销售诸环节形成一条完整的供应链，一环套一环，都衔接得非常好，货物可准确到几点几分就送到商场里来上货架。商场里面没有仓库，没有这个空间。那么它的仓库是什么呢？高速公路及其路上跑的货车就是它的仓库，它以时间消灭了空间，所以这个企业成本非常之低。

②以空间消灭时间。例如造船，过去采取的是“流水线”运行方式，前面一个工序完成以后再做后面一个工序，这样周期太长。现在制造范式发生革命，采取的是“模块化”处理方式，把好多流程由过去的前后关系改变为并行关系，成千上万个模块在不同的空间里同时制作，最后按照界面规则总装、集成，整个周期一下子缩短了很多，简直不可思议。这样一来，大大地压缩了时间，时间变得很短，甚至是零时间了，它满足了客户对产品“第一速度”、“第一时间”的需求。

现代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全面转向业务流程、运行体系、制度安排的竞争，它要求的不是某个环节而是整个系统的成本最低、时间最短，其最高目标是“三零状态”：零时间、零空间和零成本。同一企业，可视不同业务，并行“以时间消灭空间”和“以空间消灭时间”的时空转换“工程”。



6. 关于绝对和相对的关系: 相对是绝对的

就企业内部而言,过去实行绝对游戏规则,在企业里凡是达到岗位标准的员工全部录用。长此下去搞绝对制,即把绝对制绝对化,其结果是“一潭死水”。现在实行相对游戏规则,在达到岗位标准的员工中实行“末位淘汰”。长此下去搞相对制,即把相对制绝对化,其结果是“充满活力”。还是那片天空,还是那个企业,还是那些员工,只不过是经营者在理念上调整了一下“绝对”和“相对”的关系地位,其结果就不一样了。就企业外部而言,过去实行绝对游戏规则,敌人就是敌人,朋友就是朋友,两者界限分明;现在实行相对游戏规则,敌人也是朋友,朋友也是敌人,两者界限模糊。例如,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把竞争对手纳入同一个价值链、供应链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把纯粹的竞争关系改变为竞合关系,以此共存共长。就经济关系而言,传统理论对其界定的绝对权威性也遭到了重创。例如,生产和流通的关系,过去生产决定流通,现在则是倒过来了——流通决定生产;过去我们讲生产型企业控制流通型企业,现在则是倒过来了——下游控制上游。价值链上离用户越近的企业越厉害,以后的发展是以流通企业来重组整个生产企业,流通从过去的末端环节成为今天的先导环节。再如供给和需求的关系,过去供给决定需求,供给创造需求;现在则是倒过来了:需求决定供给。有了需求马上就会产生供给。总之,相对是绝对的,这是至理。

7. 关于过程和结果的关系: 结果高于过程

过去,我们重过程轻结果,过程高于结果,过程很美,结果很差。所谓突出过程,无非是强调过程中的道德性和伦理性,结果好坏是无所谓的。现在则是,结果高于过程,只要结果不问过程。就提高企业效益而言,我们既可以通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来提高企业效益,也可以通过扩大收入分配差距来提高企业效益,但前者看上去是公平的、道德的,而后者看起来则是不公平的、不道德的。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实践表明,我们选择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过去,基于过程,我们讲究伦理公平,倡导“劫富济贫”;现在,基于结果,我们讲究经济公平,倡导“劫贫济富”。



在农村，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在城市，资本向高效企业集中。这里，贫和富指的是效率的低和高。试想，同样数量的资产，让效率低的人来经营，财富越干越少；而让效率高的人来经营，财富越干越多。鉴此，必须剥夺前者，把资产集中指向效率高的人，这就是“劫贫济富”。“马太效应”，这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铁的法则”。

与过程和结果的关系相类似的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过去，重手段轻目的。例如在对所有制问题的认识上，所有制是手段，但为手段而手段。现在，重目的轻手段，以是否达到目的来衡量手段的道德性、功利性。就像过去，为做人而做人，现在则以做事来衡量做人。

8. 关于多数和少数的关系：多数服从少数

过去，少数服从多数。人们视之真理，天经地义，习以为常，没有丝毫怀疑。现在应该倒置过来，多数服从少数。一个企业如此，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概莫能外。就任何组织而言，聪明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都是平庸之人。如果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那岂不是少数聪明的人服从大多数平庸之人吗？试想，这个社会还能前进吗？现在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少数。亦即：少数关键高于多数一般，少数关键决定多数一般，少数关键制约多数一般。根据“二八定律”，在企业里，20%的核心骨干对企业的贡献是80%，而80%的普通员工对企业的贡献是20%。“二八定律”也是“铁的法则”。所谓“多数服从少数”，是指大多数平庸之人必须服从少数聪明的人，这个社会才能发展。通俗地讲，任何组织都是“一只狼领着一群羊”玩，“狼”是少数，“羊”是多数。这样，时间久了，“羊”也会变成“狼”。

9. 关于分工和融合的关系：融合高于分工

斯密时代，分工是创造价值的主流源泉，分工创造价值；后斯密时代，融合是创造价值的主流源泉，融合创造价值。也就是说，当今时代，价值、利润、效益、收入更多的是通过融合创造出来的。各个资源、信息、知识支离破碎，在你手里、在他手里没有用处，那我把它组合、整合、融合起来，价值、利润、效益、收入就来了。目前，有的企业专门从事“网





主”、“链主”业务，即对价值链、供应链整合，使之网络化。可以预见，今后一个时期，“融合现象”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日益突出起来。例如，企业和学校融为一体，企业和市场融为一体，所有权和经营权融为一体，产品和服务融为一体，工作和学习融为一体，经济和文化融为一体，等等。过去，文化就是文化，经济就是经济。现在，企业文化成为经济因素，而且是最重要的经济因素；企业文化成为一种资本，而且是最重要的企业资本。在分工和融合的关系上，分工是地，融合是天，一个企业可以采取“既顶天又立地”的运作模式。但是，从发展趋势上看，融合高于分工。

10. 关于搬山和搬家的关系：搬家而非搬山

面对一座高山，过去我们倡导“愚公移山”，现在我们倡导“愚公搬家”。现在看来，搬山，不仅成本太高、时间太久，而且破坏生态环境；搬家，不仅低成本、短时间，而且还可把以往所花费在搬山上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学习，以此创造更高价值。搬山，强调的是精神、勤奋；搬家，突出的是思路、理念。在市场经济下，思路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在思路不正确的前提下，精神越好，结果越糟。

就企业而言，正确地做事情，就是“搬山”；做正确的事情，就是“搬家”。现在看来，“做正确的事情”比“正确地做事情”更加重要。目前，“搬家而非搬山”逐渐为社会主流认可。一般而言，可有四种赚钱方式：一是站着挣钱——利用辛勤劳动赚钱，二是坐着挣钱——利用经营企业赚钱，三是躺着挣钱——利用无形资本赚钱，四是睡着挣钱——利用制度安排赚钱。前两种方式是“搬山”，挣钱越多越是辛苦，越是辛苦挣钱越多；后两种方式是“搬家”，越是清闲挣钱越多，挣钱越多越是清闲。



如何看待财富、富豪和劳动？

● 程恩富 周肇光 *

周肇光：《福布斯》中国富豪排名已经搞了几年了，尽管其准确性受到了许多人的质疑，但所受到的关注度却越来越高。从曾经“谈富色变”，到今天富人在炒作下登上媒体的排行榜，作为著名经济学家，程教授是怎么看待富豪和富豪榜？

程恩富：富豪榜是反映社会单个成员拥有可用货币衡量的财富最多者的变动状态。它应当建立在信息准确的基础上，可是，由于中国在个人申报和社会统计等方面存在信息失真问题，因而这一排行经常受到非议，或是有人觉得夸大了自己的财富，可能会引起税务等部门的检查，或是有人觉得缩小了自己的财富，没有挤进富豪榜而产生应有的名人效应。所以，以前富豪榜存在某些问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今后必须进一步注重准确性。同时应看到，除了可用货币衡量的个人和社会财富之外，还有环境（生态）财富和难以用货币计量的精神财富。

周肇光：更多富人被披露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是怎样的作用，是好的榜样，还是坏的榜样？

程恩富：我觉得人们关注财富很正常。如果财富是通过高度智慧、合法经营和勤奋劳动得到的，那么，从一定的意义上可以把一个人拥有财富的数量看做这个人能力的物化指标，他拥有很多财富是值得尊敬的。之所以仇富，可能是因为一些富人的财富取之无道，用之无道，或者人们对机会的不公感到不平。我觉得现在需要迫切解决的两个最大问题，一个是解决不义之财的问题，一个是富人如何帮助穷人的问题。

民国初年有很多下南洋的华侨回到国内，修的房子跟碉堡一样，生怕自己和家人遭受不测。当然，旧制度下掌握生产资料的地主、资本家对一无所有的劳动者进行残酷剥削是必须反对的，不然就不要进行革命，就不会有社会进步了。但今天的情况不同了。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

* 程恩富系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周肇光系上海金融学院社科部教授。



以后，应该看到，合法地拥有财富是好事情，大家都应该光明正大地追求，让生活过得好一些。别人过得比自己好，对自己应该是一种激励，应该去模仿，使自己的生活更好。财富可以是一个好仆人。我倒觉得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在现在这个时候出现很好，公众、政府、商界和学界都需要这一信息，以便了解和研究社会这个变动中的阶层和群体。如果这些富人合法致富的传奇经历能够被大众所接受、效仿，也是一件好事。

周肇光：我们注意到，如今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简单地拥有财富已经不再像过去一样获得社会的尊敬。比如现代政治家就比富翁有更特殊的社会地位。据官方统计，许多富翁愿意花一笔相当数目的钱去担任驻小国的大使，以获得社会地位。除此之外，一个人受人尊敬和认可与否还要与音乐、艺术或慈善事业等相结合。富人除了有钱之外，必须在某些领域创下相关成就，否则无法获得社会的尊敬？

程恩富：我倒觉得许多企业家进行社会资本的投资更多的是为了获得社会声望，而主要不是靠社会声望来赚钱。当然我不否认，一些处于上升期的企业希望通过好的社会声望来获得公众的信任，以利于自己的经营活动。但对于某些富人来说，他只是需要社会声望，单纯的财富已不能满足他对马斯洛所提出的全部五个层次的需求。他希望赢得社会尊敬，实现他创造物质财富以外的其他的理想、抱负。搞慈善活动是他获得这种尊敬的一个主要的途径。

我不愿意把富人慈善事业本身单纯理解成一种慈善，我倒觉得这是一种交易，是金钱与社会声望的交换。这时，大众是这笔钱的受惠者，也是社会声望的供应者。我们不去评判富人从事社会公益活动的目的的合理性，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交易成了社会财富再次分配的一个重要途径。而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社会给了使这种交易可以顺利进行的环境，使它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让这种社会声望的交易成为调节社会矛盾的一种内生变量，使社会关系更加平和。

周肇光：据对温州地区较富的私营业主的调查，他们中绝大多数觉得自己在事业上是成功者，但又感到不快乐。慈善活动也许能使他们快乐，但似乎我们的富翁参与慈善活动的相对要少一些。

程恩富：我们国家慈善事业不多，个人搞的公益事业不普遍，因为



我们现在处在社会转型期或者说改革的摸索阶段，制度、政策的变动比较大，有不确定性。此外，富人在人数和富裕程度上还处于初级阶段，又大都处于中青年时期。不光富人，穷人生活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有些富人的进取心和素质也不具有持续性，往往今朝有酒今朝醉。这里面有多种原因，不能简单地说中国富人比国外富人道德水平低。我国的大富豪余彭年决定通过法律程序将数十亿全部个人财产无偿捐献给社会而不是留给子女，就是值得大力表彰的。如果这样的富人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做得较好，是可以同意其入党。

周肇光：值得注意的是，财富的增长，富人的出现，也随之而来一些其他的社会问题。曾在《福布斯》榜上的几个人先后牵涉出经济问题，甚至发生像山西的李海仓惨遭毒手的悲剧，请问对于这些上榜富人产生的负面的东西，富人们的心态是否发生了变化？您对此是怎么想的？

程恩富：这里的关键还在于富人本身的行为，即财富是怎么来的和怎么用的。假如在这两方面出过问题，那么，有一部分迟早会被曝光的，社会公众也会有非议。这种暴露和解决，对于净化富人队伍和重新确立富人的良好形象是有积极作用的，而对于一贯遵纪守法的富人来说，则心态不会受到负面影响。

周肇光：是不是说，社会的平稳、持久发展不能只靠财富力量来驱动？

程恩富：财富的增长是国家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不是全部内容。大家都认为 1840 年的中国很差，民不聊生。事实上，如果把 1840 年中国拥有的财富跟其他国家比，中国是相当富足的。当时中国的 GDP 占全球的 28%，而现在美国的 GDP 只占全球 24%。当时，清政府从财富的占有角度来讲，雄居全球第一，排在第二、三、四位的三个国家财富之和只占中国 GDP 的 26%。中国那时很富有，但是富而不强。这就给现在的我们敲响了警钟。如何避免重蹈覆辙，避免将来富而不强的悲剧？江泽民同志多次提出要研究“康乾盛世”为何衰败的问题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富有没有使绝大多数民众福利水平提高，那么，这种富有就不是一个健康的富有。一个非常好的国家是一个让大多数人都能从经济财富的积累当中分享到好处的国家。民富国弱或国富民穷都不是理



想状态，只有民富国强才是社会主义大国的奋斗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其中的一个必经阶段。

周肇光：活劳动是价值的惟一源泉，但就劳动过程而言，显然，仅有活劳动是远远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拥有除劳动之外的其他生产要素才能进行现实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提供能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使用价值或效用。这些要素包括土地、资本、技术、信息以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等。因而，财富、效用或使用价值的源泉是多元的，是所有或全部相关生产要素直接创造的。

程恩富：这就是我概括过的“全要素财富说”。事实上，财富与价值在劳动价值论中是严格区分开的。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层属性，使用价值（财富）只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财富的物质内容总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对于劳动是物质财富惟一来源的观点，马克思曾予以严厉批判。他提出，人在生产劳动中只能改变物质形态，并且还要依靠自然力的帮助，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由此可见，同一些人随意批评马克思经济学忽视财富及其生产要素的观点相反，马克思是一贯高度重视财富及其各种生产要素作用的。

周肇光：在您看来，“全要素财富说”与“活劳动价值说”不仅不矛盾，而且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了关于创造商品和财富的完整理论。

程恩富：是的。前者说明的是作为具体劳动过程的生产要素与社会财富（商品使用价值或效用）之间的关系，其目的主要是揭示在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过程中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和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层面上，财富的源泉必然是多元的。后者说明的是作为抽象劳动的活劳动与商品价值之间的关系，其目的主要是揭示在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下新价值创造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层面上，价值的源泉又必然是一元的。

同时，二者的内在联系又表明：作为劳动主体的活劳动，既是价值的源泉，也是财富的源泉；作为劳动客体的有形或无形生产资料，既是财富的源泉，也是价值创造的必要经济条件或基础。但是，要素价值论者声称财富的源泉就是商品价值的源泉，既然劳动不是财富的惟一源



泉,那么劳动也不是价值的惟一源泉,其他生产要素的劳动一起共同创造价值。在这里,他们混淆了财富与价值、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劳动过程与价值创造过程等一系列概念。

周肇光: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全要素财富说”告诉我们,在当代社会,丰富的劳动对象、发达的劳动资料和高质的劳动者这三个实体性生产要素以及组织性要素——管理、渗透性要素——科教、连结性要素——信息、制约性要素——环境等等,都是提供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服务财富的直接来源和构成要素。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服务的需要,我们必须充分发挥一切生产要素创造财富的功能和潜力。

程恩富:说得对。当前,我们要高度重视和发挥劳动、科技、信息、管理、环境和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的作用,切实保障一切要素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促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快速而又健康地发展。

同时,在收入和劳动保障等方面要处理好所有企业的“劳动关系”、“劳企关系”或“劳资关系”。考虑到我国公有制和私有制企业都大量存在,为了概括这两类企业共同涉及的各种劳动关系和劳动争议,可以采用表明一般的“劳动关系”词汇;但严格来说,应是劳动者与企业的“劳企关系”,因为现在广泛使用的“劳动关系”一词的内涵,主要是指劳动者个人或群体同整个企业在劳动权益方面的各种关系,而劳动关系本身还有别的更多内容,如劳动者个人之间的生产和分配关系等。对于中外私有企业来说,这种一般的“劳动关系”或“劳企关系”还具体表现(实质)为“劳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国家普遍叫做雇员与雇主,并分别由工会与雇主协会代表其权益,如仅在法国就有 15000 个劳资调解委员和 271 个劳资调解委员会,涉及解雇、工资支付、休假、卫生条件、安全和精神骚扰等。我国劳动关系和劳资关系也日趋紧张,如上海市 1995 年以来,劳动争议案件以平均每年递增 30% 的速度上升(2000 年已超过 11000 件),其中非公经济的劳动纠纷达到总量的 46%,私营企业的劳动争议案件增长了近 37 倍。可见,“劳动关系”、“劳企关系”和“劳资关系”这 3 个用语都可以使用,以便从不同的角度说明问题。